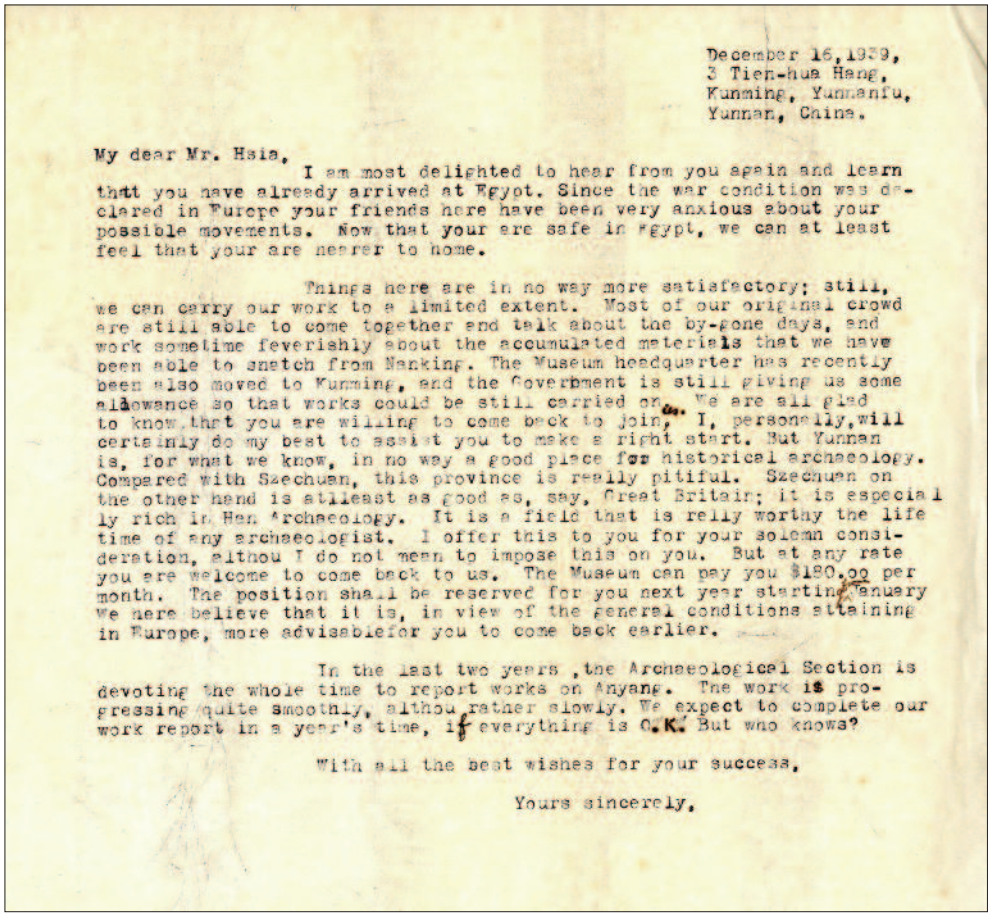
夏鼐與李濟



December 16, 1939,
3 Tien-hua Hang,
Kunming, Yunnanfu,
Yunnan, China.

My dear Mr. Hsia,

I am most delighted to hear from you again and learn that you have already arrived at Egypt. Since the war condition was declared in Europe your friends here have been very anxious about your possible movements. Now that your are safe in Egypt, we can at least feel that your are nearer to home.

Things here are in no way more satisfactory; still, we can carry our work to a limited extent. Most of our original crowd are still able to come together and talk about the by-gone days, and work sometime feverishly about the accumulated materials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snatch from Nanking. The Museum headquarter has recently been also moved to Kunming, and the Goverbment is still giving us some allowance so that works could be still carried on. We are all glad to know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come back to join. I, personally, will certainly do my best to assist you to make a right start. But Yunnan is, for what we know, in no way a good place for historical archaeology. Compared with Szechuan, this province is really pitiful. Szechuen on the other hand is atleast as good as, say, Great Britain; it is especially rich in Han Archaeology. It is a field that is relly worthy the life time of any archaeologist. I offer this to you for your solemn consideration, althou I do not mean to impose this on you. But at any rate you are welcome to come back to us. The Museum can pay you $180.00 per month. The position shall be reserved for you next year starting January We here believe that it is, in view of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ttaining in Europe, more advisablefor you to come back earlier.

In the last two years, the Archaeological Section is devoting the whole time to report works on Anyang. The work is progressing quite smoothly, althou rather slowly. We expect to complete our work report in a year's time, if everything is O.K. But who knows?

With all the best wishes for your success,

Yours sincerely,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李濟致夏鼐函（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史語所檔案》考 12-3-2）

劉文鎖　博思源（Clayton D. Brown）
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Rhodes College

古今論衡　第 20 期　2009.12

一

夏鼐和李濟是中國考古學史上兩位代表人物，他們的個人關係和淵源，折射著中國考古學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兩個時段以及在海峽兩岸狀態時各自發展的現實境況與淵源。對於李濟（1896-1979 ，字濟之），兩岸學界都曾給予高度的讚譽，稱之爲「中國考古學之父」，❶「中國現代的第一個人類學家」，❷以及「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❸等。他的確是當之無愧的先驅。其中，「中國考古學之父」這個評語，其由來還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❹

李濟生前享受盛名，在專業的範疇裡倍受推崇。因爲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個人事業與時代呼喚相契合，他以獨到經歷走出了一條道路。李濟的光環在於他的作爲學者的個人經歷，於中國的考古學、人類學、上古史研究都有開創之功，而在學術研究及學者操守上謹守科學原則，保持本色。

夏鼐（1910-1985 ，字作銘）於一九三四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留學倫敦大學，獲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一九四一年返國後，先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工作，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九年間，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一九五〇至一九八二年間，先後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一九七七年後改組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所長，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五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以對新中國考古學的組織、領導之功，加以個人在考古學、史學上的造詣，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的事業。❺

夏鼐於清華讀書期間與李濟相識，他之赴英倫留學並於出國前參加安陽的考古工作，也是得力於李濟；歸國後的一段時間裡也與李濟相處爲同事，前後得到李濟的諸多關照，他在致李濟的信中也以學生自居。❻雖然，李濟對「又紅又專的共產黨的

❶ 張光直，〈《安陽》張序〉，收入氏著，《考古人類學隨筆》（北京：三聯書店， 1999），頁 8-9 ；劉文鎮，〈論李濟〉，《考古》2005.3： 86-94 ；劉文鎮，〈重讀“中國考古學之父”〉，《光明日報》（2006.01.19），第 9 版； Clayton D. Brown, “Li Ji: Father of Chinese Archaeology,” *Orientations* 39.3 (2008): 61-66.

❷ 張光直，〈編後記〉，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0），頁 992 。

❸ 張忠培，《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序〉，頁 2 。

❹ 我們不想把它解釋爲兩岸關係戲劇性變化的表徵之一例，但是其間顯然是有關聯的。

❺《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夏鼐》（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6），頁 572 。

❻ 參見李光謨輯，〈李濟與友人通信選輯〉，「夏鼐致李濟（1942 年 10 月 24 日由浙江溫州寄四川李莊）」，

考古家」❼不無微詞，據說李濟終生仍是以夏爲其「平生最得意的兩個學生」（另一位張光直）之一而欣慰。❽二氏之間淵源既深，既有師生之誼，又各自成爲海峽兩岸中國考古學的領袖人物。當年，爲中國上古史研究奠定了科學基礎的殷墟發掘，正如夏鼐所說，「許多田野考古工作者都是在殷墟這工地訓練出來的」，其中也包括他本人。❾雖然郭寶鈞（1893-1971）、尹達（1906-1983）、夏鼐等後來都開創了自己的路，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李濟，但如張光直所說，他們在「概念上與方法上的繼承性很明顯」。❿如此說來，在整合中國考古學史——即將中國考古學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及在海峽兩岸的歷史視作爲一整體時，對之間的淵源這個問題，我們不妨聚焦在夏鼐與李濟的關係上，通過二氏的交往，他們的學問人生、道德文章，維繫他們關係的紐帶，來深入理解這兩位中國考古學的前輩。

二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檔案中，有一組夏鼐與李濟早年（一九四九年前）的通信，記錄了二人交往的一些詳情。這批資料是由本文作者之一的博思源（Clayton D. Brown）翻檢出的。在此我們想根據檔案提供的線索，來勾勒兩人早年關係的一個梗概。

當史語所考古組主持的殷墟發掘進行到第九次的一九三四年，夏鼐從清華畢業並獲得了庚款留學金。爲符合獎學金的條件，他出國前先要做一定的準備。因此，清華大學聘請傅斯年（1896-1950）、李濟作其導師，派他赴安陽殷墟遺址做考古實習。⓫在此期間，他與指導人李濟、傅斯年和梁思永（1904-1954）商量過未來的出國學習計劃。一九三五年四月三日，夏鼐致函李濟說：

《中國文化》15/16（1997）：373。當時尹達（劉燿）、裴文中（1904-1982）等人對李濟也都以學生自居，參見同著，頁 366-367, 369 等。

❼〈李濟致張光直〉，第 18 通（1959 年 3 月 30 日，臺北—劍橋），見李卉、陳星燦編，《傳薪有斯人——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 28。

❽李光謨，〈關於〈李濟・張光直通信輯錄〉——悼念光直之二〉，收入氏著，《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 195-198。

❾夏鼐，〈五四運動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考古》1979.3：193-196。關於李濟對後代考古學家的影響，參見 Clayton D. Brown, "Li Ji: Father of Chinese Archaeology"；劉文鎖，〈論李濟〉。

❿Cho-yun Hsu and K. C. Chang, "Obituary: Li Ch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0.1 (1980): 218.

⓫根據王世民在〈傅斯年與夏鼐〉（發表於「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山東聊城，2004）一文裡所說，這個實習直到翌年三月中旬至六月初才得實施。

來示已悉，承先生代生熟籌出國計劃，無任感激。生對於此事自無異議。惟所顧慮者，恐生對於考古學根底極淺，即基本科目尚有須出國後再補習者。而留學期限僅定二年固爲生所渴望（延長一年但能否辦到，權在學校殊難預定）。如學校僅住一年，雖可得廣聆諸大師之偉論，然在學無根柢之人恐漫無統緒，所得反少。

如專在一校攻讀二三年，隨一名師遊，依其指導比較有系統的由讀基本科目進而深求特殊研究，似反合宜。此係生之愚見。如先生認爲無此種顧慮之必要，則即依先生來示之計劃，作爲定論。即請還行函達清華告以擬入學校及所以改赴英國之故。如先生亦認爲專讀一校爲佳，則請於倫敦、愛丁堡、劍橋三校，代爲選定一校，亦即請還行函告清華。惟無論如何，望決定後，除函還清華外，同時請即行示知，以便生亦通知校中，托辦入學手續。

生現頗有意留多預備一年。就常情而論，自以出國愈速愈佳。但爲「實事求是」起見，似應先在國內有充分預備，對於國內需局，認識清楚然後出國，較爲適宜。預備功課之地點，或在清華研究院或在中央研究院，均無不可。前者優點，在於可以聽課（擬選讀地質學、人類學，及第三外國語等）；後者優點，在於接近導師，可以隨時請教。此點將來再定。所預備者，一方面繼續閱讀西文考古學書籍，一方面對於中國金石學及文字學等與考古有關者，加以學習。（如有機會，或再參加田野工作，或學習整理材料之方法。）同時注意漢時文獻，因生將來或即專攻從事漢代方面之考古也。此項計劃，一年之期間內，或許不能皆行達到，但至少比今夏即行出國，似乎較勝。且閱讀較多，或可得一特定問題，以爲將來出國後研究之對象。不知關於此事，先生能予以忠告否？即請示知，以便生作最後之決定。先生閱歷較深，見勢較切，諒必能予以忠告。（延長留學預備年限，依定章須由導師提出。）以上二事，煩先生代爲籌思。瀆擾精神，抱歉之至。專此奉達，敬請，近安。⓬

這封信裡談到的幾件事，一是求李濟代爲選定留學的學校，及向清華校方說情由原定留美改爲留英；二是他的出國前預備，這時他的志趣已傾向了歷史考古學中的漢代考古。這個據說出自李濟和傅斯年授意的傾向，⓭ 在那時殷墟發掘正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不是選擇上古史的青銅時代及上溯至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方向，這一點令人感

⓬《史語所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元 545-2 。
⓭ 參見王世民，〈傅斯年與夏鼐〉。也許這本是出於夏氏個人的主意。

到納悶：爲什麼不爲上古史研究培養未來的人才呢？不過，這個選擇對夏氏一生以歷史考古學的研究爲主埋下了伏筆。

圖一：城子崖第一次發掘，李濟騎驢遊龍山（攝於 1930 年秋）

在學校的選擇上也費了周折。李濟參照了當年給其清華時的學生吳金鼎（1901-1948）做推薦的先例。吳氏曾在導師李濟的推薦下於一九三三年留學倫敦大學，師從考特奧德藝術學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的葉慈（W. Perceval Yetts）教授。此人是李濟的熟人，但是專長不在考古學而是藝術史。李濟的推薦雖發揮了作用，但也引出了問題：因吳氏想要專攻考古學，所以須要改換導師和研究方向。這個問題後來夏鼐也遇上了。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李濟寫信給葉慈，請他安排吳金鼎在倫敦大學攻讀考古學，並希望葉慈介紹著名的考古學家皮特里教授（Sir Flinders Petrie）⓮與吳認識。⓯幾個月後，李濟收到葉慈的信，告知吳金鼎正在皮特里的指導下發掘近東的加沙，並請李濟多派些學生赴倫敦大學。⓰因此，一九三五年當夏鼐請求李濟的指導時，他便復函夏鼐說：

> 關於留學事，能早日起程還以早日起程爲宜，似不必多所顧慮。擬入學校倫敦大學比較相宜，以倫敦對於考古方面設備，較爲完善也。⓱

同一天李濟也寫信給清華大學，報告夏鼐的工作進程，並說明他認爲倫敦大學較爲妥善的理由。在信中他表達了對夏鼐留學的期許，並指出中國考古學發展之所需：

> 查貴校去夏留學生考試錄取之考古學學生夏鼐，自去秋入敝所練習，數月以來，努力志勤，於考古常識已漸充備，今春更赴安陽，在梁思永先生指導下，從事田野考古實習。最近該生以出國在邇，對於出國後應入何校懇求指定。就考古研究之近狀而論，中國所需之此類人才，自應有下列三種訓練：（一）

⓮ Sir Flinders Petrie (1853-1942)，英國考古學家，埃及及近東等考古發掘的主持者，蜚聲世界的埃及學家。
⓯《史語所檔案》考 21-5-7 。
⓰《史語所檔案》考 21-5-11 。
⓱《史語所檔案》元 545-4 。

> 田野考古之技術。（二）博物院保存古物之方法。（三）比較及鑑定古物之能力。以此三者爲準，倫敦方面，似比較完備。故濟意夏員應入之學校……想貴校必能樂予贊同也。⓲

顯然，對李濟而言，發展考古學是國家的事業，爲此要盡力提供條件使中國未來之考古學家接受完整而規範的專業訓練。這三個方面，自然是當務之急，也是長遠之計。至於留學英國大學的選擇，李濟的理由是有說服力的，因爲截至一九三〇年代，英國的考古學仍以舊大陸考古學的傳統位居世界考古學的主流。至於選擇倫敦大學，則純粹出於李濟個人關係（葉慈）的便利。

在此之前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夏鼐曾往已遷南京的史語所晉見傅斯年、李濟，並在李濟指導下閱讀所內收藏之中外文考古書刊。三月中旬至六月初，他參加了梁思永主持之侯家莊西北崗殷王陵區發掘實習。前揭致李濟的信就是在實習時發出的。在這個時間裡，就其出國留學的選擇事，傅、李、梁曾各有態度：李濟起初主張去哈佛大學（其母校），隨狄克遜（R. B. Dixon）學習考古方法；梁思永主張去英國愛丁堡大學，隨柴爾德（V. G. Childe）學考古技術和近東考古學。最後經反覆斟酌，選定倫敦大學。我們根據上述通信知道，這是基於李濟後來的意見而做出的。也許，在出身哈佛的李濟、梁思永看來，具有「除了人類學什麼都不是」傳統的新大陸考古學，比起舊大陸的英國考古學要缺少實學的成分。這是我們的臆測。與夏鼐同年出國的中央大學畢業生曾昭燏（1909-1964），也是選擇了倫大學習考古學。如此，我們也產生了一個假設：日後作爲新中國考古學領導人的夏鼐，當初在選擇留學國之時，如果是選擇了新大陸的美國而非舊大陸的英倫，對於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方向和特徵的形成，也許會發揮一定的影響吧。

在夏鼐決定聽從李濟意見去倫大攻讀考古學之時，李濟給他寫了一份推薦書帶給葉慈教授，這封信裡說：

> 現介紹另一位學生，他按照我的勸告決定赴貴國受考古學之特殊訓練。帶信者是夏鼐先生，他一九三四年畢業於清華大學並獲得兩年之考古學獎學金。畢業後他是我們研究所來訪一年的研究生，在此期間他在安陽的考古站受全季之特訓。因漢代是夏先生的專長，他特別期望學習與將來工作有關的學科。我自己及清華大學的相關方面都感激您能給他的任何協助。⓳

⓲《史語所檔案》元 545-3 。

⓳《史語所檔案》考 21-5-14 。原信用英文書寫，此處由博思源譯成中文。

這封信又再次說明，倫大的選擇是李濟「勸告」的結果；我們進而懷疑，對一個初出茅廬的研究生而言，所謂漢代考古是「專長」云云，可能也是李濟的意思，他對他的學生實在用心，出於中國教育傳統的人文主義情懷，他越俎代庖地爲其選擇了研究方向。因爲追崇「科學考古學」的李濟對藝術史不感興趣，會認爲那是不時之需，也非培養考古學人才的途徑；而漢代考古則是歷史考古學的另一座重鎮，將來會大有作爲的。

夏鼐在到達倫大後不久，就像吳金鼎那樣遇到了換專業的問題。他先師從的也是那位葉慈教授，然後又改換門庭師從考古學院的格蘭威爾教授（S. Glanville）。因加入考古學院，使他能夠參與在英國本土以及近東的發掘。在耶路撒冷，他與有名的埃及考古學家皮特里相識。這個過程雖如此，但在當初卻爲這位年輕學子添了一些的煩惱。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他給清華校長梅貽琦寫了一封長信，請求延長一年留學期限。[20] 在同時寫給李濟的信裡，他袒露了自己對倫大的學業的看法。李濟將他的信出示給了傅斯年，後者有覆信如下：

> 頃見致李先生書，敢盡其見如下：按，隨 Yetts 學，實無多少意義，此等大事，不可以「不好意思」了之也。此等外國漢學家，每好以收羅中國學生炫人，然我們可以向之學者甚少。兄與禹銘在彼，恐只備他顧問耳。讀書作學問，雖不可過分務遠，然亦不可不設一高標。二三年中誠未能多學，然窺一科之門徑，回頭知自己用功即可矣。[21]

這位「天才最高，最可敬愛的人」，[22] 以一貫的決斷力批判了正爲中國考古學做著貢獻的葉慈，並具有遠見地指點了夏鼐的迷津。同樣在李濟的覆信裡，對葉慈也有責備：

> 去秋接到來函，事忙至今未覆，歉甚。前日又奉到四月十三日手示，回誦再四，學勤思深，佩甚羨甚。英國大學情形，弟苦於不知，故不能冒昧建議。昨特以尊函商之於傅孟眞先生。傅先生甚感興趣，並特函奉告一切，今附陳。弟意大致與傅先生相同。外國教授收學生，往往自顧自己興趣，不顧學

[20]〈夏鼐陳請梅貽琦校長准予延長留學年限的信函〉，《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6：1-5。
[21]〈夏鼐陳請梅貽琦校長准予延長留學年限的信函〉。
[22] 胡適，〈序〉，傅斯年著，傅孟眞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第一冊，頁 2。

> 生死活，但各人需要，自己知之最切。若認爲必需換先生，決不必怕難爲情也，博物院學能留心更好。現博物院建築已開始，開院時需要專門人才處尚甚多。並祈留心代爲物色爲盼。清華處容專函代爲申請，聞梅校長不日來京，屆時當再面請之，一切容再陳。㉓

李濟信中表露出的對博物館專才的渴求，一方面是因爲其負責籌備的中央博物院之急需，但也是當初對夏鼐出國學習所寄望的三種訓練之一。看上去夏氏對這門學問並不留心，而專注於考古學，所以便囑托代爲物色海外人才（實際上並未物色到）。不過，夏氏之換專業、導師及延期的事在兩人的鼓勵和協助下順利辦成。這種理解的關懷的人文主義傳統，在李濟身上曾一再體現。

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夏鼐留學英倫期間，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和中國「抗戰」時期，在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爆發了。這個時候在中國，日軍的侵略戰爭使史語所勉力維持的殷墟發掘工作被迫中斷，考古組收工後十八天，「盧溝橋事變」爆發。㉔受傅斯年委託，李濟帶領考古組向西南遷移。先是赴長沙，然後取道桂林前往昆明（一九三八年三月），一九四〇年冬季遷至四川宜賓附近南溪縣李莊鎮。「抗戰」爆發的那年，吳金鼎從英國學成歸國，參加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工作。到了一九三九年的夏季，身處歐洲的夏鼐也已計劃返回祖國，旋因九月歐戰的爆發而成泡影。倫大的校園與宿舍關閉了。雖然大學在城外還是開設了一些課程，但考古學院還是停學了。他在英國的學業大受影響，加上掛懷祖國，歸心似箭：「戰事起發，本擬即行速返國，但以等候船期及法國過境護照簽證，勾留月餘，尚無辦法。」㉕我們可以想像他此時的心情。但他又獲得 Douglas Murray 獎學金，所以十月二十一日夏鼐離開英國前往埃及，於三十日抵達開羅。那時他打算工作數月後就返國，十一月一日致函李濟：

> 前次啓生兄來信，謂吾師已商諸傅、梁二師，設法於中研院或中博院爲生保留一位置。不知此議現下仍生效否？返國後即有工作之機會否？曾小姐㉖前有來信，謂禹銘兄組織蒼洱考察團，㉗將於十月間出發，召生入夥。不知現已出發否？明春仍有考察團或發掘團之組織否？生之故鄉（浙江溫州），幸尚

㉓〈夏鼐陳請梅貽琦校長准予延長留學年限的信函〉。
㉔李光謨，〈李濟先生學行紀略〉，《學術集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一〇，頁 53-54 。
㉕《史語所檔案》考 12-3-1 。
㉖曾昭燏。
㉗吳金鼎這時奉派到大理地區作考古調查。

> 未入寇手，家人均已避居鄉間。但以遭寇方之封鎖，交通頗爲困難。將來返國或即徑行來滇。不知以何時返國爲最合宜？尚請示知！生之計劃，擬在開羅博物館繼續研究 ancient Egyptian beads，㉘俟告一段落後，再行返國。經費方面，必要時可以自行勉強維持六個月。而研究工作之計劃，暫定三個月，必要時伸長一兩個月。如果 Glanville 教授能夠來埃，則一切事物，均可得其襄助，更爲佳妙。未悉吾師尊意如何？㉙

這封信的意思，是表達他目下的處境，他最關切的是歸國後的去處和工作安排問題。看上去歐洲的戰事尚不妨礙他在埃及的研究工作。他已打算盡快回國。對夏鼐的來信，李濟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從昆明覆函說：

> 我很高興收到你的消息並知你已到達埃及。從歐洲戰爭開始時，你這邊的朋友都很擔心你的近況。得知你在埃及安全無恙，我們覺得你離家更近了。
>
> 這邊的情況未嘗好到哪去，但我們還能完成有限的工作。我們原來的團體還能聚談些過去的事，有時候會主動地去分析從南京匆忙運來的材料。最近（中央）博物院的辦事處也已搬到昆明，中央政府還提供了津貼以便繼續工作。我們都高興你願意回來加入本單位。我本人願盡力協助你辦好（此事）。但我們知道雲南不是歷史考古學的好場所。此省較四川要可憐得多。四川至少跟——譬如說英國——差不多一樣好，它的漢代考古遺存特別豐富。此片田野眞值得任何考古家付出一生之努力。我這麼說是給你認眞思考的機會，但不想迫使你接受。無論如何歡迎你回來加入我們。博物院能給你每月 180 美元的薪水。此職位保留到明年一月，但因歐洲目前之局勢，我們建議你還是盡早回來爲宜。㉚

從李濟的回信上，能看出他對夏鼐回國的態度，及他對夏鼐歸國後參加中博工作的承諾。也許他從夏鼐在信中關於滯留埃及作研究工作的解釋裡感到了一絲的擔憂，以爲這位年輕有爲的留學生在選擇去留的問題上會猶豫不決，所以從事業上開導他。李濟可能跟中研院的同事協商過夏鼐的職位問題，當時他兼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同時接替傅斯年代理史語所所長一職。夏鼐在信中請求的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和中博兩職，很顯然前者是最合適的選擇。不過，兩年前吳金鼎歸國時，出於史語所

㉘ 埃及古珠。夏氏之博士論文即以此爲題。

㉙《史語所檔案》考 12-3-1。

㉚《史語所檔案》考 12-3-2。原信用英文書寫，此處由博思源譯成中文。

名額限制的原因，他是先被安排在了中博工作，之後才轉調史語所。[31] 從這封信中我們得知，李濟答允夏鼐爲他在中博（籌備處）留一個職位，這是出於和吳金鼎同樣的原因，他未答允爲他們安排歸國後直接進入史語所考古組的職位。這的確有點遺憾。而且，他在信中給對方預留的職位保留期限很短促（實際上一直有效），不知道這是他個人的意見還是代表中研院在表態。

由於戰事的影響，一年後夏鼐仍在開羅想辦法返國。他於一九四〇年十月致函李濟，告知已決定年底前離開埃及，亦與李濟商量回中國的旅行計劃：

> ……我將途經巴勒斯坦、敘利亞沙漠與伊拉克，一半鐵路，一半陸路。如果經費和時間允許的話，這將是一次極好的考古之旅。

他打算與中國商人同行至印度，然後獨身一人經行緬甸進入雲南：

> 因我打算在雲南與您會合，故我將在加爾各答離開中國商隊，然後獨身一人途經緬甸到雲南。有關緬甸—雲南之路況，消息很少，但我們或許在加爾各答和仰光能得到較多消息。如果因消息阻塞、經費困難，或其它不可預見之故而無法到達雲南，我可能需要修改原來的計劃而繼續與中國商隊共赴上海……也許能避開上海赴故鄉溫州，因爲它還是非淪陷區。但我更希望手裡的錢足夠讓我回雲南或上海，且無大礙。若您覺得這些設想都不切實際，而從加爾各答直赴上海更佳，請即賜函告知，以便修改計劃。另一方面，若您已答覆我十月十一日之信，而已爲我設計從緬甸至雲南之歸途，無需覆此函……我還想知道大理的考古站尚在否，是否由吳博士領導，以及地址是否還未變等問題……我們打算十二月十日從埃及出發，大約一個月後到加爾各答。盼望盡早與您見面。請替我問候所有在雲南的朋友。〔按：原信用英文書寫〕[32]

李濟的回信情況不得而知。一九四一年初，夏鼐經滇緬公路抵昆明，之後轉往史語所駐地李莊。李濟於一年以前的承諾仍然有效，他被安排在中博籌備處工作。是年，與吳金鼎一起參與中博四川彭山漢代崖墓的發掘。之後可能是爲省親返回溫州，滯留了一段時間。一九四二年，李濟向朱家驊院長推薦夏鼐，建議聘爲史語所副研究員。爲此，夏鼐於十月二十四日致函李濟：

[31]《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吳金鼎》，頁 550。另參見夏鼐撰，〈吳金鼎先生傳略（1901-1948）〉，梁思永、夏鼐編，《中國考古學報》（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第四冊，頁 1-6。

[32]《史語所檔案》李 12-3-3。原信用英文書寫，此處由博思源譯成中文。

> 濟之先生大鑒：溫州收復後，生曾於八月廿三日奉上一函報告一切，諒已達座右。接奉十月十三日來電，知已與朱院長商妥約生入史語所……生此次返里擬乘家居之暇將埃及古珠考（Ancient Egyptian Beads）一文寫完，不幸以日寇騷擾多所曠誤。自日軍退出溫州後，生即繼續工作。現已寫至 the 1st Intermediate Period 。[33] 開始時起例發凡，多費斟酌。現下工作較爲順利，大約陰曆年關可以竣事。以後將全篇加以修改補正，明春可以脫身赴川。生於此篇論文，已費多年搜集之工夫，不欲功虧一簣。一俟此項工作完畢，此後餘生即可用全力從事於中國考古學，決不辜負吾師提拔後進之苦心，惟恐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耳。[34]

這封信裡透露出一絲的隱情：可能夏鼐對其在中博的工作不滿，以爲調入史語所工作無望，曾以寫完論文爲由在故鄉滯留；到此時聽到李濟發來的好消息，所以要做出個解釋，並說出「此後餘生即可用全力從事於中國考古學，決不辜負吾師提拔後進之苦心」的話。轉調史語所的事直到一九四三年才完成。這樣，「剛毅木訥，強力努行」[35] 的李濟之先生，在促成夏鼐入史語所這個當時最好的考古學機構工作一事上，發揮了他的伯樂的作用。這裡面也有傅斯年的慧眼和助力。[36]

三

李濟於一九四八年底被委押運史語所和中博等的設備、資料、文物，遷往海峽彼岸。留守的史語所殘部處此時局之下已臨渙散運數。夏鼐退居故鄉溫州後，據云受到分別來自傅斯年和高去尋、梁思永兩方向的拉力，最後選擇去了北京。[37] 他與李濟也終生未再謀面。

[33] 埃及古史之第一中間期（約公元前 2181 至公元前 2055 年），即第七至十二王朝時期。

[34]《史語所檔案》李 14-1-2 。夏氏於一九四三年六月廿四日受聘爲史語所副研究員（《史語所檔案》李 4-1-16），一九四六年聘爲研究員。另參見王仲殊，〈夏鼐先生傳略〉，中國考古學研究編委會編，《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6），頁 3-24 。

[35] 徐志摩致李濟。參見虞坤林編，《志摩的信》（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4），頁 208 。

[36] 一九四四年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與北大文科研究所向達一起負責歷史考古組。四月前往河西走廊和敦煌等地，進行爲期九個月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傅斯年在接到夏鼐的信後回覆說：「弟就兄之報告看，極爲滿意。將來之工作，可以此爲藍圖。……本所考古事業之前途所望於兄者多矣。」（王世民，〈傅斯年與夏鼐〉）。覆於致中研院院長朱家驊信中稱：「夏君乃本所少年有爲之一人，在濟之兄領導下，將來於考古界之貢獻必大。思永久病，近年人才頗感凋零，故弟更望夏君多得經驗。」（《史語所檔案》李 38-1-17）

[37] 參見王世民，〈傅斯年與夏鼐〉。

一九五五年第三期的《考古通訊》上發表了夏鼐的文章〈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這是配合清算胡適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而發的，他以史語所爲的，是因爲「胡適當時通過了他的門徒傅斯年控制了這個研究所，同時也因爲我自己曾在這機構中工作幾年，不僅情形比較熟識，並且自己也是受到這種影響的人，借這機會順便來自己檢查一下」。[38] 他在文章中捎帶著不點名地批判了李濟的器物類型學——年代學分析方法，都是受了胡適庸俗進化論的影響在考古學上的表現，及「學術脫離政治」、「『爲考古而考古』，和歷史學不結合」的資產階級學風。

但是，如果我們暫不計較這一段歷史的表面，而去注意其中的情緣這根線索，也許會覺得夏鼐的批判對李濟還是網開了一面。到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時代）再寫〈五四運動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時，對於當年的導師李濟，也不再持批評的態度，而是不點名地表揚他是「年青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學知識和發掘經驗的歸國留學生（1918-1923 年留學）。蔡元培院長選擇後者，後來證明這選擇是明智的」。到他晚年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時，也適切地給李濟留了位置，對他的歷史地位做了應有的評價。[39]

在海峽的對岸，李濟對大陸考古學的評價也處在矛盾之中。在寫給張光直的信裡，幾次情不自禁地評論，一面說「裡面確實有些好的東西」，[40] 一面說「不知道那些又紅又專的共產黨的考古家是否有些研究？」，一面又承認對大陸考古材料「難得看到」。[41] 稍後的信裡則痛斥：

> 因爲近十年在大陸的考古，實在只是挖寶貝的變相名稱，不是要解決任何問題。凡是有問題的考古者，所具有的問題都早已洗腦被洗得光光；所以始終就沒有一種有計劃的學術性的發掘（自從失去梁思永的領導後，就走了薄古厚今的路）。[42]

這些指責並不是針對其曾經學生兼同事的夏鼐而發。不管怎樣，新中國考古學領導人的夏鼐與他有過師生和同事之誼，他內心可能會感到得意的。

[38] 夏鼐，〈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考古通訊》1955.3：1-7 。
[39]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李濟》，頁 269 。
[40] 〈李濟致張光直〉，第 16 通（1958 年 12 月 12 日臺北—劍橋），《傳薪有斯人——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頁 25 。
[41] 同前書，〈李濟致張光直〉，第 18 通，頁 28 。
[42] 同前書，〈李濟致張光直〉，第 19 通，頁 31 。

在中國考古學的研究目的和學科定位上，夏鼐與李濟有著明顯的思想淵源。李濟堅持走的是一條獨特的「新史學之路」，即將考古學、人類學、自然科學納入史學的範疇。一九四八年在臺大創辦的考古人類學系也是出於這個目的。早在編輯《中國考古學報》時（1936）就明確地提出：「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學之一，……田野考古者的責任是用自然科學的手段，搜集人類歷史材料，整理出來，供給史學家的採用，這本是一件分不開的事情；但是有些有所謂具現代組織的國家，卻把這門學問強分爲兩科，考古與歷史互不相關；史學仍是政客的工具，考古只能局部的發展；如此與史學絕緣的考古學是不能有多大進步的。這種不自然的分離，我們希望在中國可以免除。」[43] 他這裡影射的「所謂具現代組織的國家」是指美國。他這樣近乎武斷地將（中國）考古學定位爲史學，是在捍衛史語所開創的「新史學」道路。

在大陸，考古學也開創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史學之路。一九五二年，在北京大學也創立了考古學專業，設置在歷史系下面。以後各個大學陸續成立的考古學專業，所循都是同一個模式。雖然也發展出具中國特色的民族考古學，但是與海峽對岸的「考古人類學」差別太大。高舉「新史學」大旗的李濟，不一定了解夏鼐在大陸的主張；夏先生自始至終堅持的，也是「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有機構成部分」、[44]「考古學是一門歷史科學」。[45] 這裡面有著一段難解的因緣。

夏鼐和李濟的學術成就在考古學、史學界廣爲人知。他們分別成爲新、舊中國和海峽兩岸中國考古學的領袖人物。雖然在一九四九年因政治的緣故曾經的友誼和合作突然中斷了，從那以後雙方在海峽兩岸獨立工作，各自領導著中國考古學的事業。我們還能辨認李濟施於中國考古學以及夏鼐本身的難以磨滅的印記。僅從這個角度講，李濟是堪稱「中國考古學之父」的。

李濟、夏鼐的一生與中國考古學的歷史息息相關。一九四八年史語所的遷臺及隨後形成的海峽兩岸中國考古學的隔絕與分流局勢，無論對他們個人的事業及關係，抑或中國考古學學科來講，都造成了巨大影響。李濟遷臺後心境之漸趨悲觀，憂世的成分遠大於個人遭際，這一點也能夠看得出來。[46] 他於兩岸政局開始發生巨變之時離開人世（1979），已經看不到因這個變化而逐漸產生的後果，對一些方面來講，已經

[43] 李濟，〈編輯大旨〉，《中國考古學報》第一冊，頁 1-2 。

[44] 夏鼐，〈十年來的中國考古新發現〉，《考古》1959.10：505-512 ；《科學通報》1959.21 。

[45] 夏鼐，〈什麼是考古學〉，《考古》1984.10：931-935, 948 。

[46] 李濟晚年感到世事淒涼，曾給許倬雲寫信說：「世事日惡，不知終於會變成什麼樣子。你年輕，或許會往樂觀方面想；我已老衰，眼前實在看不見出路。」〈李濟先生學行紀略〉，《學術集林》卷一〇，頁 107 。

發揮出了可以樂觀期待的效應。在他遷臺後，他當年曾傾注心血培養的學生夏鼐，以傑出成就成爲大陸考古學的領導人，並在他辭世後六年也離開人世。這對師生生逢其世，在海峽兩岸敵對的政治狀態下各自沉浮，又各自擎舉著不同的「新史學」旗幟；維繫他們關係的紐帶，是超越了一切意識形態的人文傳統。他們也不會想到在其身後，兩岸關係幾經變化，經受著考驗，兩岸學界的交流也在漸趨深入，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世事雖難料，我們情願相信未來取決於今天處理問題的態度與方法，而今天正是從過去所走來。作爲後來人，我們只能期待，因爲一個似乎天造地設的因緣，有著共同淵源的兩岸考古學將會在學科內在規制下，開創出一條更加可行的途徑，重走到一起。